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教材系列

变革中的哲学文化思考

阮纪正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变革中的哲学文化思考

阮纪正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革中的哲学文化思考/阮纪正著. -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4

ISBN 7-5361-2033-8

I. 变… II. 阮…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8314 号

变革中的哲学文化思考

阮纪正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番禺市石楼官桥彩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75 印张 360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1-2033-8/B·52

定价: 25.00 元



作者近照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教材编辑委员会

主编 张磊 杨绍练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培强 王光振 左连村

李克华 李新家 张磊

杨绍练 曾牧野 廖建祥

编者的话

近几年来，我们受广东省高教厅的委托，在广州市及省内一些地区举办了经济学和历史学有关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函授进修班，受到各地区的高度重视和普遍欢迎，广大在职干部通过进修培训，深感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对本身素质的提高起很大作用。他们强烈要求将授课的内容编写成本，以利于他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为此，我部组织了授课教师和院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编写一套研究生系列丛书。继本院副院长李新家教授撰写的《消费经济学》出版后，由本院哲学所阮纪正副教授撰写的《变革中的哲学文化思考》又与读者见面了。阮教授多年来在哲学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他为我院研究生讲授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研究等课程时，能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论述深刻，观点明确，极受学生的欢迎。现将其研究成果及授课内容精选成册，供本院研究生及其他在职研究生学习使用。今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这套丛书，欢迎广大学员和其他读者对本丛书提出宝贵意见，给予批评指正。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

1997年4月

自序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本书是作者41岁“专业归口”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11年来发表成果的一个自选集。篇目约占所发文章的四分之一，字数约占所发文章的三分之一强，除有关武术文化研究的文章，应用研究的文章，报道性的文章，还有重复过多的文章，应酬性的文章，篇幅过小的文章，以及跟别人合作的文章，规划草案和若干会议文章及内部文稿以外，主要的东西都收集在这里了。现在把它汇编起来重新发表，首先是敝帚自珍的意思。它不但反映了改革以来一些社会观念的变化，而且还反映了作者人生探索的一个阶段，对同道者来说，或许从中可以获得若干参考资料。

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书中文章不揣浅陋，对当前若干社会热点问题，大胆地提出了个人一得之见，用以尽自己的公民责任。它反映了本书作者在这个变革年代中对这些热点问题所进行的文化思考；其论点未必精到，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真、善、美那真诚而且执着的追求。文章风格是朴实无华“白描”式的；但由于作者视角独特，没有去跟风从众，或许可以使不少人觉得“耳目一新”。在这里，作者认识到激烈并不等于彻底，反叛也不等于超越；因而特别注意避免若干情绪化了的空话、套话和大话，努力于平实处见尖锐，稳重中求彻底，通过事实本身的鲜明反差，直奔需要说明的主题。又由于现在远未达到消灭阶级的世界大同，因而也就不去附和那些“告别革命、远离政治、消解主流、淡化意识形态”的时髦了。全书编排，按内容

分三类，每类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除少数篇章恢复发表时因篇幅关系而删去的文句段落，个别意犹未尽的还作了在原意基础上的发挥，有些因重复过多而略作技术处理和文字修补，多数的文章则一仍发表之旧，以存历史轨迹。

我们先看看全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全书分三辑。第一辑，“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是从当今现实的矛盾运动出发去探讨中国的社会发展。在这里，作者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敢回避面临的矛盾，就改革开放方法论的角度提出若干引人深思的问题，力图从理论导向的角度去推动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第二辑，“精神文明与民族凝聚力”，是从文化发展和古今对比的角度，去探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这里，作者注意立论冷静平实，坚持“反左防右”的辩证立场，并力图寻找一些时髦思潮的历史源头。一方面，反对“食古不化”，另一方面，又反对“食洋不化”，在坚持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突出精神文明批判现实、创造未来、形上超越、终极关怀的本质。第三辑，“哲学比较纵横谈”，是从中外对比的角度去探讨哲学的人文类型和民族特征，希望能在对比中凸现出我们炎黄文化的主要特质，并研究这种特质在当今条件下对我们的影响，及其进一步演化的可能性，希望由此能给我们发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一个文化参照系。三大部分，一是讲当下状况，二是讲古今问题，三是讲中外对比，共同组成一个立体框架的三维空间。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本书第三辑“哲学比较纵横谈”，原是作者应《比较哲学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编委会的邀请，为该书编撰的有关章节。

总起来说，作者在写作时注意了以下几点：一、坚持独立思考，决不跟风从众和欺世媚俗，努力体现理论的革命批判精神和作者个性特征。二、注意立论冷静平实，绝不用激烈姿态冒充理论的彻底，更不用一些情绪化了的空话和大话去哗众取

宠，努力追求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三、是在立足实践和拓宽视野的基础上，对各种社会现象作宏观的综合思考，力图使文章具有较大的信息量，努力避免各种可能的片面性。四、是注意综合岭南文化的敏锐、细致和中原文化的厚实、气势，努力做到粗中有细、放中见收、引而不发、和而不同、以静待动、后发先至，使文章不但有可读性而且有耐读性。

本书中的这些努力，是跟作者本身的社会阅历和生命感受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而且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个人成长。早在中学时代，作者就对社会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更以全身心投入紧张的学习；不料由此却被极左路线当作“白专”的典型予以排挤。接着是下乡搞“四清”接受锻炼。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反对北大聂元梓所推行的路线，在学校办公楼礼堂搞过一次“反聂学术讲座”论证聂元梓所犯错误，结果又在档案中被塞入黑材料，长期当作“内控使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洞庭湖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两个年头，接着再分配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的山村工作。先是在农村公社当“驻队干部”，然后到了县“五七干校”，接着又用“搞三分之一”的名义再下放生产队“蹲点”，最后则派到海南岛搞水稻杂交。“四人帮”垮台后本应获得解放，不料却因“思想犯嫌疑”而被按“既定方针”从海南召回县里隔离审查，不准回家及不准跟亲人见面长达四个年头，直到1980年7月才宣布解除审查，结束“莫须有”的罪名而得以重过常人生活。是年底回到广东，先为建材部门办技工学校，并在广州武术馆当兼职教练。1984年底，终于“专业归口”调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并于1985年起开始了正式的研究工作。当时作者不但连初级职称也没有，而且还从未接触过研究工作，更未写作发表过文章。

上半生的坎坷经历就像入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不但磨去了自己头脑中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还锻炼出一双孙悟空般的“火眼金睛”。作者的学术思想，就是在城步农村劳动中形成的。当时虽然没有什么书籍和资料可看，但实际生活却像一本打开了的书。由此作者比较认真地观察了当地农村的生产结构和运转方式，并将这些东西跟运动中一些口号进行对照，由此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东西。十多年的农村生活于是从“代价”变成了“财富”。作者的学习和研究，终于找到了一个真实的支撑点。社会基层的生活方式，使作者的屁股始终坐在劳动人民一边；而作者受的不完全教育固然是个遗憾，但由此却又不受某些成见的约束，坏事于是变成了好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如果缺乏阅历，那是难以深入下去的。作者庆幸自己并不是一个纯书斋式的学者。记得在离开城步时，该县当时的组织部长曾明确地表示过，像作者这样的人，是绝对不适宜安排搞理论工作的。但现在作者不但在搞理论工作，而且还要把自己理论研究的成果汇集出版，这说起来真是令人感慨！由于本书思考的源头是作者 70 年代在湖南城步县形成的，而且书中的全部内容也都是当时思考问题的直接延伸，所以现在愿把此书呈献给养育过自己的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的支持和资助，还得到江门市（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林永年、《江门日报》副总编李文照、《学术研究》常务副主编刘斯翰和广东高教出版社何业光等诸位同志的指导、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年已古稀的林老，其扶持后进的古道热肠一直激励着作者的努力。在此特表衷心的感谢！

阮纪正

1995 年 11 月 30 日

于广州天河寓所

目 录

自序

第一辑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

试论改革中宏观和微观的关系	(1)
关于对外开放的方法论若干考察	(17)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特指概念	(33)
改革开放提出新课题	(39)
论我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探索	(69)
警惕目标模式的观念扭曲	(81)
注意战略选择的操作混淆	(109)
也谈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探索	(121)
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	(149)
试论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观	(167)

第二辑 精神文明与民族凝聚力

也谈观念更新	(183)
对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思考	(201)
试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辩证统一	(211)
改革开放与现代公仆意识	(227)
中华民族凝聚力：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	(239)
改革开放与民族凝聚力	(247)
市场经济与“理论务虚”	(257)
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	(275)

关于“人的价值”若干问题的思考·····	(285)
关于“个体道德价值”的三个问题·····	(295)
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概说·····	(303)
儒家文化传统与当代道德建构·····	(315)
试论岭南近代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	(331)
第三辑 哲学比较纵横谈	
比较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345)
中、西、印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异同·····	(381)
中、西、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异同·····	(413)
中、西、印价值观和人文学说的异同·····	(449)

试论改革中宏观和微观的关系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牵涉到上下左右各方面的一个广泛而又深刻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处理宏观改革、微观改革以及这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从方法论上去进行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1984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金汶同志《宏观、中观、微观改革的辩证法》一文（以下简称金文），率先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就改革的目标、步骤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应该说，文章中不少观点是富有启发的。鉴于文中提出的看法牵涉到当前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方法论问题，而且在思想认识上还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笔者不揣浅陋按金文提出的问题谈点个人认识，并就管见所及提出一些跟金文不同的看法来向同志们请教。

一、整体并非个体简单集合，宏观不是微观简单放大

按社会上一般的理解，“宏观是就整体而言，微观是就构成这个整体的个体而言的”。至于宏观跟微观、整体与个体到底是通过什么来联系和转化的问题，人们则往往认为是简单清晰而不言自明的。有种不成文而又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认为：整体即是个体的相加，宏观就是微观的放大。从这个理论前提出发，国民经济宏观体制的活力被归结为单个微观企业活力的

累加，而单个企业活力本身又被归结为孤立个人积极性的总和。于是，所谓“积极性问题最大”、“人的因素第一”之论不胫而走，改革的目标，被集中到单独的具体个人身上。在这里，“宏观”的社会问题变成了“微观”的个人问题，客观的社会关系也变成了主观的个人认识和情绪。就这样，体制改革的关键变成了先验的个人“观念更新”和简单的企业素质改造。

整体由个体组成，宏观包含微观，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整体并非是个体的简单集合，宏观也不是微观的简单放大。为什么一个复杂的整体不能看作许多小的单元的简单组合？这主要是因为一个整体内的各个要素，并不是完全独立、彼此无关的，它们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例如反馈、自催化、自组织、自复制等现象。因此，一个整体并不就是各个局部的简单线性叠加。对一个复杂的系统必须进行整体性的研究。

对于整体功能除有元素性质的可加和性外，还有更重要的非可加和性这个特点，人们早就注意到了。例如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就不但正确地指出过，“凡是由若干部分组成，其总合并非只是一种堆积，而且整体又不同于部分”，而且还接触到事物的“组织程度”高低的问题。^①近代黑格尔的整体观是人所熟知的。到了马克思时代，整体观就不仅被奠定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而且还被推广应用到人类社会。《资本论》就曾具体地论证过“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说明“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指出“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②

按现代系统科学的观点，所谓整体跟个体，宏观跟微观的

关系，可以概括为系统跟要素的关系。而沟通这系统跟要素的中介，就叫做结构。可以把结构定义为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要素、成分相结合的方式或构成形式。它是由各要素、成分的特殊本质及相互作用决定的，并按照其本身发展规律逐步形成的内在关系。通俗地说，结构即事物内部诸要素的组织形式。它包括空间关系上横向的组合、纵向的层次以及时间关系上发展的序列这么几个方面，并且表现出跟环境相互作用的相应内外功能。一个系统的整体性质与规律，存在于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个体、分系统）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亦即组织结构中。组成整体的各个要素的孤立特征和活动的总和，不能说明整体的特征和活动方式。与此相反，这些要素却受整体活动规律的制约，并在一定的方面反映出整体的特征。整体和部分相互之间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但又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整体和部分相互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反馈和变换。由于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和关系不同，二者空间特征也不必相同。一般地说来，所谓整体与个体，是从系统的横向组合结构角度去说明问题；而所谓“宏观”跟“微观”，则是从系统的纵向层次结构角度去说明问题。现在金文把这两种不同角度的结构分析混为一谈，严格地说也是不准确的。

就经济的分析来说，现代经济学通常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前者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分析，后者则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考察对象。这里所谓“宏观”和“微观”中的“观”字，表明它们都只是一种观点，亦即人们在认识对象时所采取的不同角度和不同方法。事实上认识对象本身是个统一的存在物，并非真的有分别独立存在的“宏观”客体和“微观”客体。经济学上的“宏观”系统和“微观”系统，都是互相联结、高度统一的系统现象，是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去考察同一经济体系运动的结果。对于联结经济学上“宏

观”系统和“微观”系统这两个不同层次的经济结构，我们则可以根据不同的实践目的从不同的角度去加以分析。例如，我们可以就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运动去分析它的生产结构、流通结构，直到再生产诸过程的总结构；也可以就社会中同时存在的各种生产方式综合运动去分析它的所有制结构、经济决策结构、经济调控结构、利益动力结构、管理组织和管理方法结构以及信息传递结构等等；还可以就某些具体的技术经济问题和措施去分析它的产业结构、资源结构、能源结构、劳动力结构、投入——产出结构等等各式各样的结构。这些不同角度的结构分析还可以交叉并行地进行。系统中联结“宏观”整体和“微观”个体的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正是这诸如此类的客观存在的结构，把具体的生产企业单位联结为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形成这个经济体系本身一定质的规定性。从理论上说，不同的系统结构表现出不同的系统功能，具有不同的行为模式。这就是结构的绝对性。但是，表现同一功能行为的系统，也可以具有不完全一致甚至很不一致的结构模式。而且就人们对这些系统结构模式的认识，以及根据这种认识去调节、控制和改造系统来说，还可以是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以及不断地发展深化和变化的。客观存在的系统结构在自己运动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的认识也无法穷尽系统中的一切结构和行为。这就是结构的相对性。

我们并不否认组成国民经济实体的各个企业的素质以及组成每个企业的人员素质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某种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也不否认诸如积极性和创造性一类精神力量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反作用。但是在实践上，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人们都无法调动一切人的一切积极性。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社会并不是孤立个人的简单集合，而任何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的产

物。不同个人或企业的不同积极性，是可以互相冲突和抵消的。所以社会的整体活力，即使用机械力学来描绘也不可能是各个分力的线性叠加。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活力”，而是在各种活力现实矛盾耦合中沿着预定目标方向具有某种放大机制和调控功能的社会经济结构。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分化，已经使组成国民经济的各个经济实体、职能机关、联系渠道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都具有很不不同的存在形态、结构组合和联系方式。在这里，“宏观”经济跟“微观”经济的不同层次有着并不雷同的协调功能。

我们现在所谓的体制问题，可以用一定的结构模式来进行描述。因而所谓体制改革，在一定的意义上便可以看作是一种结构改革。我们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要使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那些“小而全”、“大而全”互相雷同的产品经济结构，逐步走上真正具有职能分化和多种网络联系的商品经济道路。两个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简单交换行为，就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个体活力的框框了。所以目前我们所搞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不能不首先考虑经济运动的整体效应。

那种把整体看作是个体累加、宏观当作微观放大观念的认识论根源，在于只片面和表面地看到整体由个体组成，宏观包含着微观的简单事实，而不能进一步看到整体跟个体、宏观跟微观到底是通过什么东西联系和转化，不能进一步看到系统中不同层次的不同结构和不同功能。这种观念的社会历史内容，则是来自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小生产。在农业自然经济小生产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组织十分简单，人们年年从事重复自身的简单再生产，而整个再生产的条件又简单到只需要土地和劳力两项。这种结构的极其简单，使人产生无所谓结构或不需要结构的印象。所谓“一双肩膀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在土地到手以后，只要有劳力，那就“万事不求人”了。由此产生